

挑战鲁迅

陈漱渝 主编

——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



四川文艺出版社

准挑战鲁迅

陈漱渝 主编

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陈漱渝主编.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12 (2003.1 重印)
ISBN 7-5411-2088-X

I. 谁... II. 陈... III. 鲁迅 (1881~1936)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②I21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3149 号

策划组稿：金 平 袁继东
责任编辑：龚明德 袁继东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史小燕
责任印制：龙小龙
责任校对：邓永勤等

书 名 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 定价 39.00 元

主 编 陈漱渝 ISBN7-5411-2088-X/I·1796

2002 年 5 月第一版

2003 年 1 月第三次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35.5

字数 527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电话：(028) 86666700 [发行部]

(028) 86663129 [编辑部]

电子信箱：scwys@mail.sc.cninfo.net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公司照排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卫干院印刷厂印刷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 86636481 8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28) 87438866

总序

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
鲁迅的几次论争 陈漱渝

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心目中，鲁迅作品的经典地位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有的学者宽心地说：“鲁迅作品已经进入经典，无须任何人来保卫。”

何谓“经典”(canon)?据我理解，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作品中长存在读者记忆中的那一部分；或者说，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它垂范后世，但却为数有限；它并非流行，但却比流行更为久远。每次重读，都会感到历久弥新。判断经典学术价值的是批评家，决定经典流传价值的是读者群——在经典与读者之间，也经常进行互动。

毫无疑义，经典的构成有其相对稳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成为经典有其客观的标准，如内容的真善美、形式的不可重复性、思想的穿透力、对历史进程和文学自身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但经典又是流动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长期被人视为经典的作品也会受到质疑、挑战和重新审视。在这种再选择的过程中，伪经典将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经典却经过冲击和磨砺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无论古今中外，经典作品都会面临诸多挑战。

新时期以来，围绕鲁迅问题展开过多次论争。这一时期时间跨度有二十五年，即从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今。其中，人们又习惯于把开始确立市场经济模式的一九九二年作为后新时期的开端。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鲁迅研究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和变化的条件下，在中外文化和文学思潮空前冲撞交汇的形势下进行的。作为对鲁迅研究发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首先应该提及发生于一九七八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正是这场讨论，彻底砸碎了现代迷信、教条

主义和新蒙昧主义的精神枷锁，使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从属地位中解脱出来。一个凝固的、板结的、一体化的文学秩序由逐渐松动而终于解体。这场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确立的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原则使鲁迅研究领域恢复了活力与生机。

新时期关于鲁迅的第一次论争，是围绕重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过而展开的。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过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公开发表的“纪要”全面推翻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左翼文化运动意义的崇高评价。以这份“纪要”为政治依据，一切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左翼文化有关的人士都遭到了残酷整肃，作为“左联”盟主的鲁迅从而也在实际上被架空。从《国际歌》问世到“革命样板戏”出台这中间一百多年的中国文艺史，变成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发表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话，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发表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从而拉开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战线拨乱反正的序幕。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鲁迅研究界根据教学和科研的迫切需要，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院校的中文系联合发起，于同年底先后召开了“三十年代文学讨论会”，对“革命文学论争”、“左翼作家联盟”和“两个口号论争”进行专题研讨。这几次研讨会的主要成果，是彻底推倒了“四人帮”对中国左翼文化运动

的诬蔑不实之词，充分肯定了这一运动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培育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的文艺队伍等方面的伟大历史功绩。讨论中也出现了不少分歧，其中论争最为激烈的是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两个口号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论争，当年参与的左翼文化界人士有一百多人，发表的论争文字达二百余篇，近一百万字，直接涉及对鲁迅后期的历史评价。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无论是以周扬为首的“国防文学”口号的倡导者和拥护者，抑或是以鲁迅为首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双方都竭诚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愿为此而斗争。由于当时正处于党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革命大转折时期，处于地下状态的上海文化界党组织又跟陕北党中央关山阻隔，因此左翼阵营内部认识产生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究竟哪一个口号更符合党的统一战线需要，更能全面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与会学者的看法却见仁见智。当时有好心人从维护文艺界安定团结的良好愿望出发，曾建议有关宣传领导机构作出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历史决议，但由于这些问题时至今日大多已属于学术范畴，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和文件形式统一舆论。

今天回顾发生在新时期之初的这场论争，感到应该吸取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必须克服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残余。开展这场讨论时，“左联”时期的许多老战士尚健在。他们在“十年浩劫”中备受磨难，劫后余生，因此，对历史上论争双方观点评价的高低，就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历史功

过，而且难免影响到他们的现实处境。所以，他们直接参与新时期的这场论争，难免夹杂历史上的恩怨，因而在文字上有情绪化的表现，妨碍了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这些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学术评价。二、既要敢于正视左翼文艺运动历史上曾经产生的缺点、错误，又要善于用科学态度对待和分析这些缺点、错误。在这次讨论中，虽然不同意见的双方都承认“两个口号论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但涉及到具体问题时仍过分纠缠于个人责任，把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地归结于个人品质。比如：冯雪峰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之下，撰写了一份交代材料，题为《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这份材料先在鲁研界广泛流传，后在一九七九年二月《新文学史料》第二辑公开发表。这份材料涉及到三十年代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的领导人周扬、夏衍等同志，同时也谈到“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冯雪峰在这份材料中同时郑重声明：“在一九三六年时，我没有发现周扬、夏衍等人同王明有什么组织的联系，现在也想不起可供追查的线索。”事后周扬感动地说，冯雪峰“没有乘‘四人帮’恶毒诽谤我的时机，对我落井下石，把一切错误和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虽然，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所谓‘揭发’我的话，其中也有传闻不实之词，但并不是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但夏衍的看法跟周扬不尽相同。一九八〇年初，他在《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又于一九八五年出版了长达三十三万字的《懒寻旧梦录》，再于一九九一年在《新文学史料》第四期发表了《夏衍

谈“左联”后期》的访谈录，多次对鲁迅和冯雪峰进行或委婉或直接的批评，诸如指责冯雪峰有“宗派、行帮情绪”，“偏见和固执”，“骄傲情绪”，“一言堂”。他还认为“鲁迅究竟不是党员”，标新立异提出新口号，“不利于统一战线”。夏衍的上述看法在鲁迅研究界引发了争论。三、评价左翼文艺运动内部论争的是非曲直，应该就事论事，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宜粗不宜细，不应机械地跟路线斗争和路线错误挂钩，更不能搬用“路线错了，一切皆错”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模式。比如：当时有些学者认为“国防文学”口号的倡导者未能充分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是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在党的历史上，直到一九三八年右倾投降主义才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这就使被批评者难以信服。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邓小平指出：“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邓小平在同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所以，对待左翼文艺阵营内部论争的功过是非，也应该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二

由于冯雪峰在上述交代材料中提到“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促使茅盾在新时期率先提出了反对“神化”鲁迅的口号。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和同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上，他尖锐指出：

“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茅盾举出的例证之一，就是有人把鲁迅的旧体诗《湘灵歌》说成是为纪念杨开慧而作。茅盾说“据我所知，鲁迅并不知道杨开慧，我也没有跟他谈过杨开慧”。然而，一九八一年八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十二期，刊登了茅盾回忆录之十二：《左联前期》。文中说，一九三一年底的一天，他跟雪峰同志拜访鲁迅。他告诉鲁迅：“毛泽东是共产党里的大学问家，博闻宏论，谈笑风生；他的夫人杨开慧却相反，是个贤淑腴腆之人，整天不声不响，带着两个孩子。”可见他又跟鲁迅谈过杨开慧。茅盾还指出：鲁迅研究中也“两个凡是”的问题，即，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在《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中，他举例说，在胡风问题上，就表现出鲁迅的“失察”。由于“没有看透胡风的真面目”，“不但冯雪峰为胡风所利用，鲁迅亦为胡风所利用”（一九七九年二月《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但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就颁发了第七十六号文件，作出了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正式平反的决定；同年底，胡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作协顾问，全国文联委员，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鲁迅是否在胡风问题上“失察”，也就不言自明。

在反对现代迷信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意见，无论涉及何人，无论所举的例证是否妥当，都具有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鲁迅生前就撰文反对神化任何个人，并亲手撕毁了别人强加于他的一顶顶纸糊的假冠。反对神化鲁迅，有利于冲破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对鲁迅研究的无形束缚，有利于挣脱僵化的单一的政治解读模式，创造出一种自由探讨、平等切磋的宽松的人文环境。

不过当时鲁研界李何林、王得后等人也对茅盾的上述提法进行质疑，认为反对神化鲁迅，首先要明确“神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否则进行论争就像近视眼看匾那样，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明眼人一看，匾还没有挂出来。你说毛泽东神化了鲁迅，他说毛泽东不但对鲁迅有所批评(比如批评鲁迅对中医、京剧的看法片面；对农民的落后面描写多，斗争性表现少；杂文谈社会现象多，关注经济问题少)，也有所保留(比如肯定鲁迅后期杂文没有片面性，就是对他的前期杂文有所保留；说杂文时代已经过去，就是对鲁迅杂文的当下意义有所保留)。其实毛泽东对鲁迅的论断并非都是他的创见，他只不过是站在政治家的立场和高度，根据鲁迅其人及其创作的 actual，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出发，综合了广大读者对鲁迅的看法，对鲁迅作出了总体性评价和本质性概括。不少鲁迅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对鲁迅的基本评价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你说“四人帮”神化了鲁迅，他说“四人帮”实际上是在歪曲鲁迅，在政治上利用鲁迅，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神化。“四人帮”中的王洪文

是个草包。“四人帮”中的军师张春桥三十年代就化名“狄克”跟鲁迅进行过论争。“四人帮”中的文化杀手姚文元说，“用今天的眼光看”，鲁迅作品“可删之处尚有不少”，极力制造出版鲁迅著作的障碍。“四人帮”的主帅江青害怕鲁迅著作暴露了她在三十年代的隐私，竟通过戚本禹从鲁迅博物馆调走了全部鲁迅书信手稿。

不少鲁迅研究者还认为，在反对神化鲁迅的过程中，有两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公允的提法不一定达到公允的目的，概念与事实之间有时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同一旗号下，有人在用放大镜从伟人的相对完美之处寻找疵点，在伟人的高大身躯上挑剔微不足道的灰尘，对伟人进行醅评苛责。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这些人又为那些大节有亏的人曲意辩解，绞尽脑汁从阴暗处寻觅亮点，极力用人性的普遍弱点来抹杀大是大非。他们对待鲁迅和周作人的不同态度就是明证。二、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并不在于他具有人的普遍性，而恰恰在于他具有区别于一般人和一般作家的独异性。比如，鲁迅的个人阅历极为丰富，具有不可替代性；鲁迅思想具有平民性、深刻性、否定性；鲁迅广采博取，气魄恢宏，其作品体现了民族化与现代性的高度融合，等等。正是上述独异性、非凡性，才使鲁迅成为了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成为了中国十三亿人当中的“这一个”。

三

跟反对“神化”鲁迅有关，一九八〇年初，王蒙在《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一文。他

认为，鲁迅提出的“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虽然是一个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命题，但“缓行”并不是超时间、超空间的真理，“缓行”并不是“永不实行”。在共产党改变了被镇压、被迫害处境而成为了执政党之后，已基本上具备了“费厄泼赖”的实行条件；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肆虐十年之后，提倡“费厄泼赖”更是一剂对症的良药。王蒙对 fairplay 这个外来词语内涵的界定是：“‘费厄泼赖’意味着和对手的平等的竞赛，意味着一种文明精神，一种道德节制，一种伦理、政策的和法制的分寸感，一种民主的态度，一种公正、合理、留有余地、宽宏大度的气概，意味着‘三不’主义和‘双百’方针。”王蒙特别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注意“费厄”，在学术问题上尤其需要“费厄”，对敌人也非绝对地无条件地不实行“费厄”。王蒙的上述看法是在总结了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切中时弊，发人警醒。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得到了一些杂文作家的呼应，但在鲁迅研究界也引发了一些不同意见。

对王蒙文章的异议主要在于，他在当前提倡的“费厄泼赖”和鲁迅当年反对的“费厄泼赖”是不是一回事？王蒙说，“对待鲁迅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在‘费厄’问题上不能搞僵化和‘凡是’”。那么，鲁迅提出的“‘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原则究竟是不是真理？在新时期要不要当做孩子洗澡后的脏水泼掉？

王蒙在这篇文章的“作者附注”中特意说明：“据说‘泼赖’的英文原意是凡事以游戏态度对待，不要过分认真。本文提到的‘费厄泼赖’，是指我们在历次运动中反对的那种‘费’

厄泼赖’，是指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平等讨论、留有余地之意，并不包含提倡游戏态度之意”，可知王蒙谈的并非 fairplay 的原意，而是在借题发挥。其实，此前半个世纪，鲁迅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时候，开篇解题也曾经声明：“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按：即 fairplay）的含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者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可见，鲁迅在文中谈的并非英国文化，而是中国国情。鲁迅谆谆告诫中国读者的是：“对于‘落水狗’（陈按即指本性不改的敌人）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再次强调：“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显然，鲁迅在这里讲的是被压迫者面对压迫应取的态度，所反对的只是对怙恶不悛的摧残者实行恕道，“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这种用鲜血换取的历史经验不仅在当年是真理，在当前仍然是真理。至于在“左”的专横下对人民内部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绝不是鲁迅“缓行”论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而恰恰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没有穷追猛打酿成的苦果。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的，是所谓“鲁迅为专制利用”的问题。青年批评家谢泳在《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文中提出质疑：“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为什么新时代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作为自己的旗帜，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岭南文化时报》）他认为这是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非得拨开这些迷障不可”。

其实，“利用”原本是一个中性词。“利用”的性质各不相同，“利用”者与“被利用”者的关系各不同，“被利用”的对象也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有自愿与无奈之别。鲁迅生前多次被利用，有他乐意的，也有他不乐意的。鲁迅也预见到他死后会有人谬托知己，以他的死尸为沽名获利之具。但如果因为“文革”时期鲁迅曾被政治势力利用，就认为鲁迅的思想实质与专制主义相通，则大谬不然。因为鲁迅提倡的是以弱势群体为本位的斗争哲学，其实质是反压迫、反专制。专制主义需要的是奴隶哲学，而不是以维护被压迫者利益为前提的斗争哲学。如果要鲁迅对“学生打死老师”一类历史悲剧承担责任，那显然是不公平的。至于新时代用鲁迅做旗帜，那是因为鲁迅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对过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旧时代；而胡适是旧政权的诤友，新时代自然不会高抬一个肝脑涂地为旧政权补台的人。

四

八十年代中期，围绕《杂文报》和《青海湖》杂志发表的两篇文章，又引发了一场声势很大而学理性很差的论争：一篇文章题为《何必言必称鲁迅》，刊登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杂文报》；另一篇文章题为《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发表于同年八月《青海湖》文学月刊。《何必言必称鲁迅》用轻薄的口吻把鲁迅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杂文著作）称为“鲁货”，把接受鲁迅的影响称为“鲁化”，并给鲁迅扣了一顶“受王明‘左’的路线影响”的大帽子。《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一文把鲁迅的文学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准备时期（1906—1918），创造

时期(1918-1925), 衰退时期(1925-1936)。在“准备时期”, 鲁迅“文学活动实质上只是习作”, “实际上, 这个时期的文学活动是失败的”。在“创造时期”, 鲁迅的作品瑕瑜互见, “有泛泛之作与充数之篇”。即使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奠基的《狂人日记》, 在该文作者看来也只停留在“模仿”的程度, “而不是创新”。享有世界声誉的《阿Q正传》, 在该文作者看来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即以所谓的本质代替形象”, 把“典型化”变成了“脸谱化”。包含了鲁迅全部人生哲学的散文诗集《野草》, 居然被该文判定为“二流作品”。在“衰退时期”, 鲁迅“惟一称得上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故事新编》, “但是艺术价值不高”。

除此之外, 该文还提到鲁迅“有两项不能算为创作的工作: 杂文与翻译”。文章认为鲁迅的翻译是失败的——“诘屈聱牙, 不堪卒读”。而鲁迅的杂文, “宗旨是谋生的手段与论战的需要”, “这就从本质上决定杂文缺乏文学价值”, “不过是鲁迅先生创造力衰退的又一例证”。经过该文作者这样一描绘, 鲁迅构筑的辉煌的文学殿堂就成了一片废墟。

《何必言必称鲁迅》一文的作者当时是安徽铜陵财经专科学校二年级学生。他后来认识到: “青年人不了解鲁迅, 简直是一场悲剧。鲁迅先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他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民永远值得骄傲的财富。如果我稍微多读一点鲁迅的书, 也不至于写出如此浅薄的文章。”《杂文报》之所以刊登这篇作者自认为“完全是由于无知闹出了一场笑话”的文章, 跟该报当时的编辑意图和舆论导向不无关联。

此前，这家报纸的副主编就发表谈话宣扬“写杂文不一定要学习鲁迅”的观点，完全违背了该报“继承五四以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传统”的创刊初衷。

《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一文的作者认为，“重新认识鲁迅是历史的必然”，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为撰写这篇文章而花费了六年的业余时间，精神也颇为可嘉。但“重新认识”不等于恣意贬低，全盘否定；要重新认识，至少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论前提和理论前提。该文作者在论文的开首援引了丹纳《艺术哲学》中的一段话：“只消看看艺术家的生平，就发觉通常都分做两个部分。……第一个时期是真情实感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墨守成规与衰退的时期。”这就是他把鲁迅中期和后期统统划归为“衰退时期”的理论依据。其实，对于丹纳的上述观点，不能作机械理解，更不能作为普遍的创作规律看待。因为在中外文艺史上，像“庾信文章老更成”（杜甫：《戏为六绝句》）一类作家并不乏其人。创造力取决于智力因素、动机因素、个性因素等综合性因素，它可以属于所有年龄段的人。有很多伟大人物寿命很长，晚年一直从事创造活动，直至去世为止。比如：托尔斯泰在他创作活动的晚期（1881—1910）写出了长篇小说《复活》。歌德晚年仍然诗情洋溢，完成了收入《西东合集》里的不少抒情诗和哲理诗；他的代表作《浮士德》写作延续了将近六十年，直至逝世前一年才完成。塞万提斯五十岁开始创作《堂吉珂德》，直到去世前一年（1615）才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二卷。雨果发表小说《九三年》时已经七十二岁。伏尔泰创作出色的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时已经六十五岁。萧伯纳完成他的政治讽刺剧《苹果车》时已经七十